

专家 学者 实业家卷

中 华

迟到的理解

名人纪实

珠海出版社

中华名人纪实丛书

迟到的理解

关鸿 余之 成平主编



珠海出版社

(粤)新登字 17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迟到的理解/关鸿等编

(中华名人纪实丛书)

ISBN7-80607-111-3 ¥ 16.20元

I. 迟…

II. ①关… ②余…

III. 中国—纪实—名人

IV. I25

迟到的理解

© 关鸿 余之编

终审:成平

策划:成平 魏心宏

责任编辑:李一安

装帧设计:冯建华

出版发行:珠海出版社

地址:珠海吉大景乐路图书大厦4层

电话:3331403 邮政编码:519015

印刷:南昌市印刷十二厂

开本:850×1168mm 1/32

印张:12.875 字数:310千字

版次:1995年12月第1版

1997年2月第2次印刷

印数:5001-10000册

ISBN7-80607-111-3/I·68

定价:16.20元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本书系编选作品,因部分作者地址
不详,请速与本社联系,寄稿费样书.]

目 录

- 和陶夫子相处的日子····· 张劲夫 (1)
- 胡适杂忆····· 唐德刚 (13)
- 胡适的晚年····· 周尊攘 (48)
- 林语堂出国以后····· 施建伟 (63)
- 梁实秋在最后的日子里····· 施建伟 (92)
- 怀念李公朴同志 ····· 张光年 (113)
- 清贫的荷塘
——朱自清弟弟回忆朱自清 ····· 周其俊 (122)
- 我的父亲顾颉刚 ····· 顾 潮 顾 洪 (126)
- 迟到的理解 ····· 李学勤 (142)
- 直到生命的最后
——献给我的养父孙浩方 ····· 李 昭 (151)
- 梁思成之死 ····· 林 殊 (160)
- 我眼中的风景
——贾植芳先生散记 ····· 应 红 (180)
- 文化神州
——记著名学者谭其骧 ····· 潘 真 (186)

曹聚仁在香港的日子	罗 孚 (194)
我所浅知的钱钟书先生点滴	舒 展 (208)
董鼎山一家子	冯亦代 (216)
我印象中的鲁桂珍博士	马伯英 (226)
居里夫人和她的中国学生	陈力菲 (236)
永远的妈妈	
——我国妇产科界泰斗何碧辉教授	
.....	陈 旻 王水金 (245)
试管婴儿之父张民觉	王 进 (258)
忆陆晶清教授	朱伯康 (266)
谢希德与曹天钦	周其俊 (270)
中国农学界第一位女教授——曹诚英	农 女 (281)
冰玫瑰	
——一个从南北极走来的女人	陈 钢 (288)
张伯驹先生	蔚 明 (299)
我的弟弟吴清源	吴 炎 (309)
羽西的世界	周玉明 (320)
荣氏兄弟在 20 年代	
——荣氏家族创业之初	薛尔康 (335)
船王包玉刚	铁竹伟 (364)

和陶夫子相处的日子

张劲夫

陆定一同志 1982 年在一篇文章里有这样一段话：“早在 1927—1937 年这一段白色恐怖时期里，白区的党由于国民党的‘宁可错杀一千，不要放过一个’的法西斯政策，和党内的王明路线，白区党被破坏殆尽。……这时，异军突起，出现了以宋庆龄、何香凝、鲁迅、沈钧儒、邹韬奋、陶行知为代表的非党员的共产主义者，宣传共产党的主张，还宣传共产主义的世界观。他们对革命是立了大功的。”^①这番话是符合历史实际的，我是这段历史的见证人之一。

自 1932 年冬至 1936 年夏陶行知出国，在将近四年的时间里，我与陶行知每周都要见一两次面，我和他的晓庄学生们，已养成习惯，称他为“老夫子”。在近四年的时间里，我受到了两方面的影响：一是地下党的影响，一是“陶夫子”的影响。陶

^① 《陆定一文集》第 781 页。

夫子教人之道何谓也，一言以贯之：“人民第一，人民至上，一切为人民。”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做到为人师表。陶夫子在一切为人民这一革命最根本的问题上给我的教益，是促使我提着头去找共产党的重要推动力。而恰在这时，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就在我面前，帮助我学习社会科学，使我在思想上很自然地接受党的影响。在南京晓庄学校时，就有中共地下党，而且很活跃。陶夫子对中共地下党员的工作，是尽力掩护并放任给予活动机会的。他曾说过，要他到街上去做贴标语、喊口号这类的事，他要考虑，他以为要作的斗争很多。说明他当时对“左”的一些做法有不同的见解，是持保留态度的。到了上海以后，在他主办的山海工学团、晨更工学团等单位里，是地下党的有力据点。我之走上革命道路，既受到地下党的教育，又与陶夫子要我与人民站在一起的教育有关，这都是我永远不能忘记的。下面我要简要介绍陶夫子怎样由党的朋友成为党外布尔什维克的情况。

1930年4月陶夫子被国民党反动当局发布通缉令，他逃亡上海及日本，于1931年3月潜回上海，匿居在法租界。申报馆的史量才是著名的爱国报业资本家，对陶的处境深表同情，秘密聘请陶为《申报》总管理处的顾问。陶向史提出革新《申报》的三条建议，均被史采纳。自此《申报》的政治评论、读者来信、副刊的文章，旗帜鲜明地反对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要求动员全国力量，一致抗日。据负责当时史与陶的秘密联系人《申报》馆经理马荫良在回忆文章中认为：《申报》的政治态度与陶先生的政治态度是一致的。从某种程度上讲，《申报》支持进步势力和救亡运动，是由陶先生掌舵的。尤其是在反内战的态度上，《申报》于1931年6月30日、7月2日和7月4日发表的三篇时评《剿匪与造匪》、《再论剿匪与造匪》、《三论剿匪与造匪》，是史约陶彻夜长谈由陶修改定稿，坚决反对蒋介石的

“剿共”政策，要求实行民主，共同抗日。对此，蒋介石又惊又气，亲手批了“申报禁止邮递”的手令，《申报》因此被邮禁35天。史量才不仅顶住了国民党的压力，并接受陶的建议，支持宋庆龄为首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成立，主张政治民主，反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陶还建议史量才聘请一些著名的爱国学者名流参加《申报》的工作，以增加《申报》的知名度。陶本人则以“不除庭草斋夫”的名义，发表了104篇杂文，《申报》因此销量增加四五万份。陶用“斋夫”笔名发表的文章，大多不足千字，短小精悍，文笔犀利，观点鲜明，融战斗性、讽刺性、幽默性于一炉，深受读者欢迎。

在1932年2月，国民党特务在上海炮制了一个所谓《伍豪等脱离共产党启事》，《申报》在陶的影响下，接受地下党的斗争安排，使国民党反动派阴谋遭到全部破产。陶夫子不是共产党人，在自己尚未被解除“通缉”之前，以一腔正气，面对邪恶势力，针锋相对与之斗争，做到了一个共产党人应该做而难以做到的事。他这一高贵品质，令人肃然起敬。

也就在1932年2月之后，陶的通缉令被取消了。他是一位教育家，总想在教育方面为人民做点实事，恢复南京晓庄学校计划不能实现，曾在上海做过一段“科学下嫁”运动，接着于1932年秋冬，在上海郊区办了几处工学团，这是陶在《申报》所写长篇教育小说《古庙敲钟录》的具体实施。而陶面对的政治现实，又是不能回避的，他原先不擅于进行政治活动，对“左”的政治活动采取审慎态度，但当斗争需要他投身斗争行列时，他是热烈勇敢的。1932年12月，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正式成立，据马荫良回忆，宋庆龄与陶经常在史公馆会面，陶起了促进作用。1933年6月，杨杏佛被国民党特务暗杀，岂料杨死后的第二年，史量才又被蒋介石派特务暗杀于沪杭公路上。晓庄学生的血，挚友与爱国志士仁人的血，都促使陶夫子更坚决地

走上革命的道路。

1933年，英国前陆军大臣马莱爵士率领“世界人民反战大同盟代表团”到上海，受到反动派的百般干扰破坏，在地下党及宋庆龄为首的一些进步人士的奋斗下，远东反战会议终于在上海开成了。陶夫子支持了这一会议，并带着马莱爵士等到上海工学团参观，随便找了一个孩子张健问了几十个问题，他对答如流，马莱被这个孩子辩得哈哈大笑。陶夫子一直不插嘴，只作他们的翻译。这场“舌战马莱”，给马莱和在场的外国朋友都留下了深刻印象。

1933年5月，陶夫子勇敢地参与了由蔡元培领衔的一百余人发起的马克思逝世50周年纪念会。5月14日，上海市青年会举办科学的社会主义讲座，尽管到处布满暗探，他毫无畏惧地赴会。他在这时期认真阅读英文版的马、恩著作，如《资本论》、《共产党宣言》等。有时坐在公共汽车上，也在阅读。

也就在这年的3月15日，晓庄学校在沪学生集会纪念创校日，他为自己所创作的《锄头舞歌》添了一段歌词：“光杆的锄头不中用呀，联合机器来革命呀！”这首歌在国内外广为传唱。陶夫子说：《锄头舞歌》之所以赶得上时代的精神，最重要的还是后头这一段。这说明，他在教育实践中和参与政治活动实际斗争中，认识到工人的重要。因为，他这时已在沪东、沪西工人地区，办了好几处工人夜校、劳工幼儿团，经常接近工人，交了一些工人朋友，朱冰如就是其中突出的一位。这一时期陶夫子还与左翼“剧联”田汉、“社联”的钱亦石、杨东莼等，过从甚密。至于和“教联”的地下党员刘季平、王洞若、徐明清等，都是他的学生，接触更多。当时受到“左”的影响的地下党员，有时批评陶有改良主义幻想。陶夫子总是含笑而听，深沉地思考。他曾诚心诚意地对自己的学生，一些青年共产党人说：“我是你们的篱笆，当心别把我冲倒了。”这是何等感人的肺腑之言。

当刘季平被捕后，他在短短的四小时内，筹措 500 块银元，请律师为刘辩护，争取了轻判。当徐明清被捕后，他巧作安排，三次派朱冰如去苏州监狱送寒衣。对关在漕河泾已判刑的陆维持及其后的张敬仁，每年都要王洞若和我设法送衣、送物、送钱给他们。陶夫子对地下党员的深情厚爱，不仅表现出师生谊，而是更深的阶级情啊！

1934 年，陶夫子热心于推广小先生制，探索普及大众教育的新路，又为新安旅行团到上海，热心为之宣传，而对陶夫子家庭来说，却遭遇母丧、妻病、儿伤之痛。在太师母入殓的时候，陶夫子哭得十分伤心地说：“母亲、文漾（师姑，已去世）、纯宜（师母），你们实在是三位最伟大的女性，都是被我拖垮累垮的啊！”陶夫子在葬母后，同意将病妻送到神经医院，非常理智地吩咐伤愈的陶宏说：“快去保险公司把人寿保险款子提出来吧！山海工学团和新安旅行团都需要经费。”他用这笔款子，买了一架电影放映机和一个发电机，买了影片拷贝，供山海工学团、新安旅行团放映唤起民众抗日的影片。尔后，新安旅行团曾带着它走遍华北、华南，把他对母亲伟大的爱和孝，播送几万里。像这样感人的事，在 20 年代也有过。他不仅放弃月薪 500 银元的高薪，去到乡村拿每月 100 月薪当赤脚校长，他和朱经农合编的《平民千字课》的稿酬，因发行量大，稿费数字也很大，陶师姑文漾在世时，曾想从稿费中取出 5000 元用于养家，陶夫子未有同意，全部拿去用于推行平民教育事业。陶夫子这种损己利人的精神，实在令人衷心钦佩。他为国家、为劳苦大众献出了一家，他的一家又都是伟大的殉道者。

1935 年，日本侵略者的铁蹄早已越过长城，侵入华北，中华民族有亡国灭种的危险。陶夫子遇到了两件事，使他在政治上发生了思想的飞跃。一是中共“八·一”宣言传到上海后，他坚决响应；二是“一二·九”北平爱国学生运动爆发后，他首

先响应。在“一二·九”之前，上海文艺界已在秘密征集 328 人的签名，“一二·九”运动一传到上海，《上海文艺界救国运动宣言》即于 12 月 12 日发表。以此为序幕，上海各界爱国运动，犹如燎原之势，迅猛发展。并于 12 月 27 日，正式成立了《上海文艺界救国会》，陶当选为执行委员兼教育委员会主任委员，具体主管教育界的救亡运动。陶领导的《生活教育》杂志社、上海工学团，也以团体名义加入该组织。1936 年 1 月 6 日，上海文化界救国会通过了陶夫子亲自起草的《国难教育方案》。同月 23 日，正式成立了国难教育社，一致推举陶夫子为理事长。由此，陶夫子也由过去用教育革命来配合政治革命的教育家，成为以从事救亡运动为主要任务的社会活动家了。

1936 年 1 月 28 日，由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及各救国团体在市商会共同发起召开了“一·二八”事件四周年纪念大会，先由沈钧儒报告开会宗旨，次由青年歌咏团领唱《义勇军进行曲》、《一·二八纪念歌》，再由陶行知、李公朴、史良等发表演说。当陶夫子用热烈、悲愤的语调讲到“我们今天损失的国土，有现任行政院长蒋介石先生老家浙江省二十八个大”的时候，群情激愤，当场呼“打倒卖国贼”、“国人团结起来抗日救国”等口号。会议通过四项议案后，全体与会者，在主席团成员带领下，一路游行到庙行，公祭“一·二八”牺牲的烈士，沿途有上万爱国学生、各界群众加入队伍，从而促进抗日救国运动的进一步发展。

5 月 31 日至 6 月 1 日，在上海召开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大会，陶因已去香港作出席世界新教育会议的准备工作，没有参加会议，但仍被选为执行委员和常务委员，成为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主要领导成员之一。

陶夫子在香港的月余时间里，最重要最有影响的一件事，就是参加了由胡愈之起草的《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

求》一文的讨论，陶与邹韬奋首先签字，然后由邹带到上海，与章乃器、沈钧儒作进一步的修改。7月15日，由沈钧儒、陶行知、章乃器、邹韬奋四人签名的这一重要文件，在各大报刊上公开发表，引起了全国各方面的重大反应。8月10日，毛泽东发表了《团结御侮——复章乃器、陶行知、邹韬奋、沈钧儒四先生的公开信》，对“团结御侮”文件予以高度的评价。毛泽东的公开信发表后，更引起了国内外人士对“团结御侮”文件的重视。

此后，陶夫子受救国会的委托，担任国民外交使节，曾去欧、美、亚、非28个国家和地区，进行抗日救国宣传工作，收到了很好的效果。1938年秋回国后，于年底到重庆出席全国参政会，推行战时教育，创办育才学校、社会大学。抗战胜利后，参加并领导国统区的民主运动，推行民主教育，成为国统区有威望的民主运动的领导人之一。我与陶夫子在1936年分手后，就未有再见面，1946年7月26日，当我在山东解放区从广播中听到陶夫子逝世噩耗后，十分悲痛，他的伟大形象，一幕一幕印在我的心中。

下面我还要叙述陶夫子在办山海工学团的教育实践中留给我的教益。山海工学团是陶夫子在上海创办的一个很重要又很有影响的教育单位，也是上海地下党在白色恐怖下一直隐蔽发展的有力据点。我从1932年冬到此后，于1935年任团长（即校长），直至陶夫子出国，一直受到陶夫子的教育熏陶。

山海工学团设在上海市与宝山县交界的孟家木桥，以全体社会成员为教育对象，首先成立儿童工学团，并设有小农场、木工场、袜工场、藤工场。以后陆续设立了联合卫生室、幼儿园、青年及妇女日校、夜校、流通图书馆、茶园、养鸡场、棉花工学团等。工以养生，学以明生，团以保生，它将工厂、学校、社会打成一片，产生一个富有生命力的活细胞。为了向所有成员

普及教育，陶夫子倡导运用小先生办法，即知即传人。为着帮助小先生提高，陶夫子倡导了“艺友制”，办艺友班，课程有国文、数学、生物、哲学、英语、政治经济学、音乐、舞蹈、时事等，除有固定的教员（称指导员）上课外，还经常聘请文教界著名进步人士来作专题演讲、上课、教唱歌等。其中有艾思奇、沈钧儒、田汉、邹韬奋、洗星海等。此外像沙千里、章乃器、沈志远、贺绿汀、吕骥、钱亦石、钱俊瑞、舒绣文、麦新、孟波、杨东莼等著名人士，都曾前来讲学，教歌，可谓极一时之盛。

陶夫子在山海工学团的这些做法，实际上是在进行反封建、反帝国主义的新民主教育革命，不过是用工学团形式出现罢了。在这段期间，陶夫子有几个显著变化。

一、在一切为人民这一根本问题上，过去侧重在为农民服务，这时期强调要为工人服务，认识到工人力量的重要和伟大。他亲自去接近工人，曾到女工朱冰如家去访问过。他曾说过，只要在工人上下班时，到沪东、沪西去看看，就可领会到工人力量是了不起的。

二、在哲学思想上有一个新的飞跃，正式将名字由知行改为行知。明确提出“行动是老子，知识是儿子，创造是孙子”。不仅与王阳明的唯心主义彻底决裂，也与杜威的实验主义彻底决裂，如对杜威的“疑问生假设——”命题，指出：没有行动，哪里来的疑问呢？由此基本上确立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观点。

三、在教育与政治的关系上，由过去的以教育革命来配合政治革命，正式转变为要有明确的政治目标，这样生活教育的内容，才能真正体现时代精神，才能真正为挽救国家危亡、为人民（他称之为劳苦大众）求自由解放作出贡献。

从前述陶夫子在当时社会活动方面，尤其是和群众一起投身到救亡图存的斗争方面，在推行国难教育方面，在办山海工

学团的思想与实践变化方面，及其后的领导国统区的民主运动方面，可以看出，在陶逝世后，周恩来给党中央的电报中说：“十年来，陶先生一直是跟着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党的正确路线走，是一个无保留追随党的党外布尔什维克。”这一评价是中肯的。毛泽东称他是“伟大的人民教育家”，他是当之无愧的。

这里，我还必须着重说一下陶夫子在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问题上对我的教益。毛泽东在《青年运动的方向》一文中说过这样一段话：“早几天，我作了一篇短文（指《五四运动》），我在那里说过这样一句话：‘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的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我在这里提出了一个标准，我认为是唯一的标准。看一个青年是不是革命的，拿什么做标准呢？拿什么去辨别他呢？只有一个标准，这就是看他愿意不愿意、并且实行不实行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在一块。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结合的，是革命的，否则就是不革命的，或者是反革命的。他今天把自己结合于工农群众，他今天是革命的；但如果他明天不去结合了，或者反过来压迫老百姓，那就是不革命的，或者是反革命的了。”又说：“所以我们看人的时候，看他是一个假三民主义者还是一个真三民主义者，是一个假马克思主义者还是一个真马克思主义者，只要看他 and 广大的工农群众的关系如何，就完全清楚了。只有这一个辨别的标准，没有第二个标准。”我认为这段话是很深刻的，是在知识分子问题上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用这段话来看陶夫子，我认为陶夫子不仅愿意而且真正做到与广大工农群众相结合，并且贯彻始终，老而弥坚。那么，进一步来考察，什么叫“结合”呢？我的体会，不是指在口头上做到，重要的是在行动上做到，这个行动应包括政治实践、工作实践、生活实践以及在思想感情上，真正做到与工农群众同命运、共呼吸、心连心。陶夫子提出的“人民至上、人民第一、一切为人民”，

他首先在教育事业上、在大众诗歌上是这样说这样做的，其后
在政治主张上，在参加政治活动中，也是这样说这样做的，而
在思想感情和生活实践上，更是处处想着人民，处处表现毫不
利己、专门利人、损己利人的精神，他的道德形象是极其高尚
的，不仅是一位伟大的人民教育家，而且是一位伟大的爱国者，
是一位伟大的新民主革命战士、是一位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他
给予我最深刻的影响，主要就是在这一革命最根本的问题上，以
其身教，为我树立了一个活生生的榜样，这是使我终身受益的。

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识别标准，我认为同样适用于全国解放
后对脱产干部的识别标准。有人说，脱产干部与知识分子是不
一样的，不能照套这一识别标准。我认为可以，因二者都不是
体力劳动者，而是智力劳动者。我们提倡过知识分子工农化，
也提倡过工农分子知识化。对脱产干部中的知识分子不用说是
适用的。即使是对工农分子，在知识化后同样是适用的。因为
工农分子知识化后，一定要做到来自工农、回到工农，才能说
明他没有忘本，没有变质。也有人说，毛泽东的话，是在新
民主主义革命战争时期讲的，不适用于全国解放后的社会主义
革命和建设时期。我认为不仅适用，而且比之战争时期更适用，
更重要了。理由如下：在战争时期，对脱产干部的考察识别有
三个条件：一是组织了解，二是群众反映，三是敌人“帮忙”。
在残酷的白色地区斗争和根据地的战斗斗争中，面对强大的敌
人在残害我们的同时，也就从客观上帮助我们看清自己干部的真
、假、好、坏。这种对敌斗争的考验，是过硬的动真格的，一
般是伪装不了的。全国解放后，情况不同了，前面两点是相同
的，而后一点没有了。再加上未有改革前，由行政机构掌握财
经大权，政企不分；在这样情况下，遇到有关物质利益问题时，
是否做到公私分明？在干群关系中，是否做到遇事能把人民
利益放在第一位，遇事能做到与人民站在一起，处于人民之中，而

不是站在人民之外，更不是站在人民之上，这是关系一个干部品质问题的要害问题，这是识别干部是真革命还是假革命，是真马克思主义还是假马克思主义的唯一标准。伟大的口号，高尚的言词，都不及在实际行动中真正做到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经得起检验。如何来检验呢？组织上的考察识别是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靠群众，群众的眼睛是亮的，每人心中都有一杆秤。因此要寻找如何依靠群众的办法，思想教育是重要的，更重要的是靠法制。记得毛泽东在回答黄炎培提出的新政权能否避免旧中国历史上“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规律时，毛回答：能，我们靠民主。小平同志曾几次提出要有监督制度。我觉得探索建立民主监督制度，来依靠群众识别干部，这是解决党风、廉政的要害问题。最后，我还需要说一点我与陶夫子的私交情况。陶夫子的名言：“爱满天下。”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对于像我这样的学生，他处处充满着爱。他的爱，不仅爱之以情更重要的是爱之以德，不空说，讲实际。师生间的交谈是很随便的，有如家人父子。有时谈话谈到肚子饿了，他就请我有时还有王洞若去“洁而精”川菜馆、“致美楼”徽菜馆小吃，而每次都是他付账，他这时已无固定收入，主要以卖文为生。1934年，陶夫子主编的《生活教育》半月刊出版了，他要我将实际生活、实践体验写成稿子，以提高水平。还要我撰写“大众生活素描”，促使我去了解大众生活疾苦，为大众呼喊。我曾写过三篇，第一篇，他亲自帮助修改了一句半文半白的話，因陶夫子是积极提倡大众语的。他知道我家境困难，要我用大众语写武松打虎的故事，编农民识字课本，亲笔写信给儿童书局、世界书局，使我有两笔可观的稿费，帮助家里还了债并安好了家，可以无牵挂地奔赴战场了。印象最深的一次，他约王洞若和我在其住处密谈，明确表示，支持并希望我们做好党的工作。同时表示，他目前暂在党外，可能对我们的工作帮助更大。这

就是陶夫子在出国前向我俩的交心表态，由此可见陶夫子是多么好的一位党外布尔什维克啊！

我现在已年届 80，回顾六十多年的革命生涯，在和陶夫子相处近四年时期中，对于他的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损己利人，无私奉献的精神，对于他的始终如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一直到今天，我仍觉得他的形象要比我高尚得多，永远值得我向这位老师学习。